

中国共产党教育方针的百年书写:缘起、嬗变与经验

孟小军¹ 李晨程² 伍佩²

(1. 重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重庆 401331;2. 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重庆 400715)

摘要: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在近现代中国教育改革发展占据重要地位,深刻写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征程。回溯百年,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思想主线,密切联系社会现实问题,政治性与人民性辩证统一,历经启蒙兴建、曲折探索、改革调整、全面推进四个时期,指引中国教育实现了从孱弱到卓越的百年变迁。基于教育政策分析方法论视角,“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三大问题一以贯之,其回答集成中国共产党教育方针的四个经验向度,即始终以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以及遵循“政治经济制度决定教育,教育能作用于政治经济制度”的基本规律。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教育方针;教育政策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想

中图分类号:G5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1)06-0065-09

doi:10.19742/j.cnki.50-1164/C.210608

教育为立国之本,历来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影响,伴随社会的系列改革,不同时期教育内涵体现了时代化的价值理念,并集中表达在教育方针这一肯綮上。教育方针作为国家或政党根据某一特定社会政治、经济条件所提供的教育改革发展方向,从根本上决定教育目的、内容、方法等,是教育基本政策的总概括^{[1]385}。威廉·威尔斯曼曾在其《教育研究方法论》一书中谈到,历史研究之价值广而深远,从提供精确描述以理解过去,到为作出决策提供视界^{[2]28}。教育政策分析作为理解教育政策活动的价值系统与问题确认的一种教育政策研究方法,提供了洞察教育政策治理逻辑的基本前提^[3]。鉴于此,本研究立足教育政策分析方法论视角,系统回溯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寻问思想源流及发展脉络,藉以剖析其价值表达的经验向度,给予国家教育社会改革的科学理论指导,保障教育事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一、百年中国共产党教育方针的思想缘起

鸦片战争以后,在内忧外患下,传统封建教育衰微,是时西学东渐的政治思潮知闻中国上层社会。

收稿日期:2021-09-20

作者简介:孟小军(1970—),男,贵州道真人,重庆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教育基本理论。

李晨程(1997—),女,四川成都人,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教育基本理论。

伍佩(1997—),女,湖南衡阳人,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教育基本理论。

然而,随着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等的相继失败,贫穷、颓丧、动荡的社会弥散着亡国灭种的恐慌顾虑。基于对中国社会矛盾的理性剖析,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作出论断:中国出路问题的解决不单以搬用西方政治制度为依靠,须先有思想文化之觉醒,应改造国民性以解放思想。民国之初,受欧洲新学校运动及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影响,以胡适为首的新文化运动领袖力主教育改革,提倡欧美新教育思想及方法。但彼时西方社会那种狂热的工具理性发人深省,教育的理想不再是征服自然的外在技术意义与人生命中存在的内在精神意义的统一^{[4]123},技术兴趣的扩张彻底颠覆了康德笔下“人是目的”的社会理性。究其根源,马克思早前即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揭露真相,资本主义教育民主、平等、自由等美丽修饰背后实则是剥削性生产关系所构筑的顺民谎言。所谓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主导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亦能主导精神生产资料。剥削阶级的学校将底层群体视作剩余价值的生产机器,这便从根本上毁坏他们的自由意志,人为造就其思想的荒芜。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解决中国出路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列宁针砭时弊,在《俄共(布)党纲草案》中谈到教育绝无超越政治之可能,学校应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彻底消灭社会阶级划分,以共产主义为旨要培养社会的一代新人^{[5]106}。在“以俄为师”的政治呼声下,部分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列主义成为早期共产主义者,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及其教育思想^[6]。在关于问题与主义的激烈论争中,李大钊等早期共产党领导人在《新青年》杂志上连续撰文,以历史唯物史观深切洞察中国问题解决的社会根源。1919年,李大钊在其所撰《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如是说,凡人类社会的一切精神构造皆随经济基础构造变动而变动,教育亦不外乎,旧教育灭亡新教育建立乃历史必然^[7]。国民思想解放是政治社会革命的前提,在工农阶级占绝大多数的中国,教育理应关照工农大众,提升他们的阶级觉悟。陈独秀亦于1920年公开发表《国庆纪念的价值》,说教育乃智慧源泉,痛斥资本主义时代的教育专为少数富家子弟设立,多数平民没有份。他们的教育方针竭力拥护资本主义学说,将资本家看作社会不可或缺之中枢^[8]。次年,其又在《新教育是什么》一文中谈及,新教育须打破闭关主义,一切学校的概念都应为社会设立,自大学至幼稚园,儿属图书馆、实验场、博物院都应公开,使社会上人人都能享用^[9]。这些关乎教育社会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系列论述鞭辟入里,对无产阶级教育应有之政治性、人民性审慎考究,为建党之初教育政纲的创立提供了理论知识启蒙。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绝非教义,而是深入研究之起点及供这种研究应用的方法^{[10]742-743},以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为首要前提,观照某一特定阶段社会政治、经济、教育三者关系,构筑中国化、时代化的教育话语流变体系——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诚然,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书写兼有传统精义与舶来艺术,但无论何者,其融入皆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遵循,秉守政治性与人民性辩证统一的中国逻辑,贯穿教育“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三大现实问题,解惑疑难。

二、百年中国共产党教育方针的历史嬗变

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历经革命战争年代艰难探索到和平发展时期深化完善的繁复之旅,究其本质,是党和国家基于政治、经济、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所作出的教育部署干预策略^[11]。基于教育政策分析视角,观照过往百年中国政治经济社会过渡形态,考察不同历史阶段党的教育方针书写语境,对深入理解国家教育社会改革意义显著。

(一)启蒙兴建时期: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1921-1956)

1921年7月底,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嘉兴南湖顺利闭幕。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要求工人学校向政党中心机关转化,提升工人思想觉悟,阐明工会成立之必要,灌输阶级斗争精神^{[12]156}。次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宣言》,提出改良教育制度,废除束缚女性的一切法律,使女性享有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上的平等权利^{[13]394}。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又以工

人夜校、农民运动讲习所、工农补习学校等广阔阵地传达党的革命任务,动员工农、士兵、青年知识分子等一切社会力量参与政治革命运动。就时局而论,何以突围列强侵袭、军阀混战的乱局,何以扭转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垄断、政治上投机的乱象,亟待无产阶级教育解放国民思想,扩大政治革命的群众基础。因而,这一阶段党的教育方针始终萦绕反帝反封建革命主线,一切教育工作为时局政治斗争服务。

1927年,由蒋介石、汪精卫执掌的国民党右派相继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北伐功业未竟,第一次国共合作决裂。是年8月始,中国共产党领导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独立武装斗争,先后开辟井冈山、闽西、湘赣等十余处革命根据地。次年仲夏,中共六大通过《政治决议案》,明令抓紧对党员群众的教育,宣讲马列主义,研究中国革命过往时期经验^[12]¹⁶³⁻¹⁶⁴。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江西中央苏区建立临时中央政府,进一步延伸了无产阶级政治与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对话时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发表《宣言》,规定一切工农劳苦群众及其子弟自愿接受国家免费义务教育。无论男女,政治、经济、教育上享有同等权利与义务^[14]²³⁴。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报告上谈及,解除反动统治阶级赋予工农群众的精神桎梏,须执行文化教育改革,创造工农的苏维埃文化^[15]¹²。纵览苏区时期,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反封建反围剿的革命首要任务,是时兴办各类职业学校,设立成人补习学校,允许私人办学。教育密切联系革命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需求,坚决批判封建主义旧式教育、帝国主义奴化教育、国民党新军阀法西斯教育。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战掀开帷幕。在严峻的革命新形势下,一切为着全面持久抗日战争服务,党的教育方针相应调整。是年8月,中共中央洛川会议通过毛泽东所撰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提出教育制度、课程应以抗日救国为目标,实施普及义务教育方案,提升民族觉悟,开展全国性的武装训练^[16]。1938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发表《论新阶段》政治报告,强调在一切为了战争原则下,任何文化教育事业都应符合战争需要^[17]。在抗击日本侵略和解放中国人民的总方针指导下,以延安为首的革命根据地先后创立鲁艺、抗大、自然科学学院等干部学校以培养专门人才,民办公助小学、中等师范院校、职业技术学校等进一步发展。边区教育倡导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鼓励干部、群众在战斗中学习、生活。工农干部知识化和知识分子工农化,一切文教事业为抗日救国服务,是当时党教育方针的根本方向^[18]¹⁷⁸⁻¹⁷⁹。解放战争时期,党的革命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教育方针随之更迭。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发表《论联合政府》,提出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下的文化教育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绝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教育^[19]。次年5月,晋察冀边区政委会颁布《关于目前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教育总方针即坚守人民的立场,依据群众需求,从实际出发,学以致用,为人民服务^[20]¹⁰¹²。同月,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通过《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要求解决贫苦群众入学问题,改造与培养师资,充实与建立各级正规学校,加强社会教育,诸如夜校、冬学等,提高群众认识^[20]¹⁰¹²。为适应劳动生产与战斗支援的需要,新老解放区陆续举办农业学校、会计学校、医药卫生学校等专门学校和各类培训班,着力完善干部教育、中等教育、社会教育,各级各类学校的学制年限、课程设置、教学组织等趋向规范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党的教育方针基本延续早前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所发表的要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适应国家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需求”^[21],遵从人民办学方向,倡导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1949年9月,人民政协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共同纲领》代行宪法,训令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教育应为人民服^[22]⁶。是年底,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强调“教育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须向工农开门”^[23]⁸。设立人民奖助学金、废除干部子弟学校、改造私立学校等,深刻反映教育平等思想,扫盲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均在这一时期纳入正式学制。1951年3月,全国中等教育会议谈到以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的全面发展作为青年人才培养方向^[24]。同年10月,政务院颁行《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对各级各类学校的行政管理、教学计划、课程设置、修业年限、衔接关系等方面作出具体规

定,要求建立自幼儿教育至高等教育的完整教育体系^[25]。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要求国家设立并逐步扩大各类学校及其他文化教育机关,藉以保障公民受教育权利^[26]。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确立,是年中共八大深入阐释国内形势之变化,今后一个时期须解决文化教育与经济社会的供需矛盾,以教育之发展解放社会生产力。自此,我国过渡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新时期,教育探索步入下一阶段。

概括而论,以上党的教育方针密切联系中国实际,理性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教育社会问题解决的基本思路。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教育,强调教育为工农服务、为无产阶级革命与革命根据地建设服务,以及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融通,深刻揭示了这一时期党教育方针的政治性和人民性辩证统一关系。

(二)曲折探索时期:社会主义教育方针(1957-1977)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受教育者应得到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几方面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27]²⁷²。这一论述,从人才培养的具体素质层面诠释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性质。次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行《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就培养方式、领导权及价值取向等问题进行解读,即教育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贯彻落实这一方针,教育工作须遵从党的领导^[22]⁶。然此间,“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隐匿着以政代教的社会风险,教育的相对独立性被否定。随着“左”倾思想扩散,八届三中全会对国内形势作出错误论断,仍以战争年代思维将阶级斗争看作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忽略了是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战略调整、教育国际化发展趋势。再则,中苏外交关系急剧恶化、自然灾害肆虐给国民经济以重大冲击,使独立探索中国教育的道路雪上加霜。1958年到1960年,以“下乡、厂勤工俭学”为中心的教育运动在全国各大学校风起云涌。教育大跃进浪潮下,“政治”与“生产劳动”的内涵异化,教育规模无限制扩张,超越国民经济承受限度,以致教育质量高速下滑。1960年底,全国文教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提出教育工作须贯彻落实“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28]。次年,经中共中央讨论批准,高等教育六十条、中等教育五十条、初等教育四十条、研究生教育三十条等政策文件相继颁行,教育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方得以初步纠正。

1966年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思潮开始在全国泛滥,列宁关于学校乃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论断在是时被误解为学校即阶级斗争的工具。任意“缩短学制、取消考试、修改课程计划等乱象频发,教育秩序彻底崩溃,教育质量持续下降”^[29]¹⁰⁵。1969年4月,中共九大在京召开,会议通过的《党章》对之前的八大党章进行修改,受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的牵引,党内“左”倾问题持续发酵,党的教育方针偏离正确道路。1971年8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推出“两个估计”,进一步冲击了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事业。

1976年深秋,文革落幕,党和国家的政治工作逐渐回归正轨。但是时教育科学领域却分外凋敝,十亿人口的中国约只六十三万名大学生,高素质人才匮乏导致国家现代化建设步履维艰。次年10月,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高考制度正式恢复。

概括而论,以上党的教育方针在教育目的、内容、途径、领导权等问题上作出了进一步解读。但这一时期,教育方针的表述多以学校教育为主导,总体性教育政纲较少。十年浩劫期间,共和国教育事业遭遇重创,但其深刻教训为之后一个时期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历史镜鉴。

(三)改革调整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方针(1978-2012)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共中央在全面反思文革时期“左”倾错误基础上,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8年5月,光明日报刊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决批判“两个凡是”的思想藩篱,为党内工作路线的拨乱反正奠定思想基础。邓小平在是年全国工作会议上围绕教育“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培养什么人”的问题,谈到学校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之地,应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造

就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一代新人^{[30]173}。八十年代伊始,第三世界崛起为世界范围内的和平稳定创造有利条件,在合作共赢的国际交往趋势下,资金、人才、技术融入全球价值链,实行教育对外开放战略,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世界格局的高层次国际化专业人才,成为新时期教育改革发展的重点任务。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新时期人才培养应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31]。次年9月,中共十二大谈到将教育作为国民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之一,特别强调教育科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基础性地位。1983年国庆,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32],以现代化为主线,世界尺度与未来尺度为辅线,提出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的根本方针。1985年5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三个面向”正式列入党的教育方针,特别强调“教育”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统一,为适应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教育改革提供思想指导。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国际局势波谲云诡。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在西方大国的反华舆论压力下,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坚定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解放发展社会生产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计划”和“市场”的辩证统一思想渗透到教育领域,教育、社会、人三者联系愈渐紧密。作为社会上层建筑之一,党的教育方针适时完善。1990年12月,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提出教育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33]。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在“现代化”后加“建设”二字,“教育本身的现代化转化为一个独立发展目标”^[34]。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对上述内容作进一步完善,在“德智体”后加“等方面”三字,“建设者和接班人”前加“社会主义事业的”七字,党的教育方针首次以教育法律形式上升为国家意志。是时,“建设者”和“接班人”成为党关于社会主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核心话语。^[35]

新世纪以来,全球化无远弗届,新兴产业变革和新技术革命方兴未艾,中国经济与世界市场的嵌入式合作极大程度降低了大国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治理方略下,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愈渐凸显。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首谈社会实践教育,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并行列入教育方针,知与行的内涵深度衍化,发掘了“新阶段劳动实践、创造的多样性及无限空间”^[36]。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论及“教育优先发展战略”,重点阐释“育人为本,德育为先”人才培养模式、“教育公平”与“人民满意的教育”等内容。2010年7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重申教育公平问题,提出机会公平为关键,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扶持困难群众为重点,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为根本^[37]。同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民族教育、特殊教育进行全方位、系统化、多层次的远景规划,在人才培养体制、考试招生制度、教师队伍建设、经费投入保障、组织管理结构等方面作出调整。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深入阐释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仍旧存在,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就教育领域而论,宏观层面,城乡之间教育水平悬殊;中观层面,区域内校际优质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微观层面,学生个人素质、个性、创造力评估体系不健全等问题突出。鉴于此,十八大关于教育的论述重点谈到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

概括而论,以上党的教育方针始终围绕“教育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问题主线,适时推进。随着改革开放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入,党对教育问题的理解趋向完善,消除了上一阶段以政代教的社会风险。“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教育优先发展”“素质教育”“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教育公平”等语先后纳入教育政纲,对克服功利主义、工具主义等教育弊病意义显著,反映了“教育方针作为国家政权关于教育发展总纲及表达国家教育意志的本质属性”^[38]。

(四)全面推进时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方针(2013年至今)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战略高度,深入分析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重大政治论断。随着西方中心主义的跌落,“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国际力量对比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39]。新一轮科技革命重构世界政治经济版图,教育科学的基础性战略地位凸显。鉴于此,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进一步调整。2014年9月,习近平在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座谈时,以“四为服务”(即教育为人民服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为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方针明确新时代教育工作的行动方向,深入解读“教育为谁培养人”的价值问题。次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对办学方向、发展战略、价值取向、秉持原则等加以限定或补充。2016年12月,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谈到“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40]377},聚焦教育领导权问题,强调党委保证高校正确办学方向。

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全面回顾及总结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教育工作的历史性成就,深入诠释教育公平与质量、教育资源投入与分配、教育对外开放与合作等当前重点问题。次年9月,全国教育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围绕“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根本立场,论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现代教育体系建构方略,切实反映了党和国家对本土教育传统、文化资源禀赋、现实遭遇问题的审慎思考。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从战略背景、总体思路、基本任务、实施路径、保障措施等方面系统叙述新时代教育改革创新的中国方案。2021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围绕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供给、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高中阶段教育普及、高等教育分级管理与高等学校综合改革等问题^[41],作出全局部署。次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后修订,劳动教育首次以教育法律形式纳入人的全面发展体系。2021年11月,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再次谈到教育的基础性战略地位,处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期,须从政治上看教育、从民生上抓教育、从规律上办教育,持续完善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育人体系^[42]。

概括而论,以上党的教育方针从目的论、方法论、价值论三个层面诠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解释了教育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面向新时代教育社会需求,党的教育方针日臻缜密,内容逻辑流畅贯通,结构要素不断完善。在“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逻辑引领下,集大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育理论成果得以涌现。

三、百年中国共产党教育方针的基本经验

从认识、实践到再认识的百年求索中,中国共产党对教育改革发展规律的理解反思渐趋深刻。教育“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一以贯之,历史性与发展性相偕融入党的教育方针,概括起来有以下基本经验。

(一) 始终以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马克思主义并非固步在书斋里的学问,而是根植于世界工人运动和劳动人民解放的实践之中,经认识、考察及反思形成了“解释世界”继而“改变世界”的科学。实践性、人民性、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纵览百年党的教育方针变迁史,无论革命战争年代,抑或和平发展时期,党的教育方针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路,密切联系中国社会矛盾问题,致力于书写关于教育“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培养什么人”的时代化、中国化方案。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性过渡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四次重大转变,此间,党的教育方针相应更迭,从兴办工农学校传播马克思主义,提升群众阶级觉悟,一切教育作为其时革命战争服务,到适应社会主义改造与国民经济建设需要,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再到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普及义务教育,发展素质

教育,扩大教育对外开放与合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最后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建构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现代教育治理体系。在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党的教育方针跨越百年沧桑,依循国家意志及现实境遇不断改进,渐致教育、社会、人三者价值平衡,最终形成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教育话语的中国体系。

(二) 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根本性质。办社会主义的学校、社会主义的教育皆应澄清领导权问题,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政治战略优势,“建立党对一切教育工作的领导制度,健全党领导各项教育事业的体制机制,完善党和国家教育机构的职能体系”^[43]。回望百年,自新文化运动始,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到抗日战争时期密切联系战斗、生产的革命根据地办学道路,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围绕党内“左”倾问题的正本清源,以及新时期教育治理现代化战略推进,建立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加强民办学校、高职院校等党建工作等,党的全面领导贯穿一切教育工作始末,党的领导纵到底、横到边、全覆盖教育工作格局渐致成熟。历史性教育重大转折及其成就已然昭示,党的全面领导是引领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最大政治优势,也是办好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现代优质教育的根本政治保证。

(三) 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视角出发,深入考察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及大工业生产需求,揭示了生活方式、社会环境与生产分工对个人发展的决定性影响。从现代生产的角度看,大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性的,劳动变换、职能更迭、工人全面流动乃其显著特征。人们如何去适应劳动生产和职能易变的社会呢?根本途径即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里的“生产劳动”并非人、财、物的简单叠加,而是物质生产、消耗、再生产的循环过程,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范畴。回望百年党的教育方针,反映了大工业生产的社会经济基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在中国呈现出时代化、特色化的特点。早在建党之初,毛泽东就谈到教育应求知识与劳力两阶级之接近,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大跃进及文革时期,受到“左”倾思潮影响,是时教、劳结合指向体力劳动的盲目扩张,甚至与脑力劳动彻底对立,严重阻遏了教育科学发展。改革开放新形势下,邓小平深入论述教、劳结合思想,认为教、劳结合应在内容、方式上创新,与国家战略规划相适应,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新世纪以来,生产劳动、社会实践并行写入教育方针,人的需要、能力、社会关系及个性的全面发展作为知识经济时代人才的衡量尺度,人才培养彰显“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知与行的内涵深度衍化,“五全育人”体系以教育法律形式上升为国家意志。

(四) 遵循“政治经济制度决定教育,教育能作用于政治经济制度”的基本规律

作为近现代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顶层设计,党的教育方针在特定历史社会语境下产生、更迭、完善,其内涵受到一定时期党和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约束,但又能动地反映是时政治经济社会所主导的意识形态取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教育方针遵循反帝反封建革命主线任务,一切无产阶级的学校、教育皆服务于革命战争与根据地建设需要。共和国建立初期,适应国家社会主义改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以人民为中心办教育,成为党的教育方针核心话语。文革十年,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催动教育“左”倾错误持续扩大,是时党的教育方针隐匿着以政代教的社会风险,教育过度政治化以致其丧失相对独立性。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教育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基础性地位凸显,教育公平与质量、教育资源投入与分配、教育对外开放与合作等重点问题得到官方层面深入阐释,“立德树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等词语相继纳入党的教育方针。立足新的历史定位,教育更为关注宏观社会环境下的文化生态,兼顾短期发展效益与长期改革图景,党的教育方针渐由工具价值偏好向本体价值选择实现意义过渡。

回溯中国共产党百年教育方针,不仅是为了理解教育改革发展规律,更在于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新局面。处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期,党的教育方针关乎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等问题的内容体系渐致成熟。在教育“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上,教育应以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战略基点,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44]。在教育“怎样培养人”的问题上,要以立德树人之成效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尺度,深度洞悉“五育”内在逻辑关系,建立健全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政治基础、思想基础、社会基础、法制基础与技术基础。在教育“为谁培养人”的问题上,应坚持教育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48],把握与分析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发展逻辑,廓清某一特定阶段及不同阶段之间的共性与分殊,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保障教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坚强支撑。

[参 考 文 献]

- [1] 周德昌,江月孙.简明教育辞典[M].广州:广州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 [2] 威廉·威尔斯曼.教育研究方法导论[M].袁振国,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
- [3] 石连海,齐春梅.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教育方针价值取向变迁研究[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9(6).
- [4] 尹艳秋.必要的乌托邦:教育理想的历史考察与建构[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
- [5] 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6] 宋乃庆,贾璞.中国基础教育发展100年:走向公平与质量的教育——以党的“教育方针”为逻辑主线.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
- [7]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J].新青年,1919(5).
- [8] 陈独秀.国庆纪念底(的)价值.新青年,1920(3).
- [9] 陈独秀.新教育是什么[J].新青年,1921(6).
-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 [11] 王炳照.传承与创新——从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到社会主义教育方针[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9(1).
- [12] 宋荐戈.中华近世通鉴·教育专卷[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
- [13] 魏宏运.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第一册)[G].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394.
- [14]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
- [15] 毛泽东.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
- [16] 毛泽东.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J].解放,1937(15).
- [17] 毛泽东.论新阶段[J].解放,1938(57).
- [18] 陈元晖.中国现代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 [19]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J].大公,1945(5).
- [20] 顾明远.中国教育大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教育(下)[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
- [21] 李韧竹,郭戈.党的教育方针的演进与发展[J].党的文献,1994(3).
- [22] 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上卷[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7.
- [23] 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97)[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
- [24] 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开幕[N].人民日报,1951-03-20.
- [25]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一九五一年八月十日政务院第九十七次政务会议通过)[N].人民日报,1951-10-03.
- [26] 刘英杰.中国教育大事典[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
- [27] 毛泽东论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
- [28] 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N].人民日报,2021-06-29.

- [29] 王炳照, 阎国华. 中国教育思想通史[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4.
- [30]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 [3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下)(1949年10月-2009年9月)[N]. 人民日报, 2009-10-04.
- [3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33] 郑刚. 中国教育方针的百年变迁历程[J]. 教育探索, 2005(9).
- [34] 程天君, 陈南. 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百年书写[J]. 教育研究, 2020(1).
- [35] 江大伟.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教育方针的一脉相承性[J]. 东岳论丛, 2021(4).
- [36] 李珂, 曲霞. 1949年以来劳动教育在党的教育方针中的历史演变与省思[J]. 教育学报, 2018(5).
- [37] 胡锦涛. 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0-09-09.
- [38] 杨天平. 20世纪中国教育方针的百年之旅[J]. 学术研究, 2002(12): 5.
- [39] 宋德民. 立足新阶段 开启新征程全面推动教育科研事业高质量发展[M]. 教育研究, 2021(5).
- [40]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 [4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N]. 人民日报, 2021-03-13.
- [42] 怀进鹏.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EB/OL]. (2021-11-22)[2021-11-25]. <http://cpc.people.com.cn/n1/2021/1122/c441516-32288521.html>
- [43] 郑刚, 杨雁茹. 中国教育制度优越性的基本定位、根本依据和提升策略[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1): 95-103.
- [44] 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广大教育工作者热议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N]. 光明日报, 2018-09-12.
- [45]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教育方针[N]. 人民日报, 2021-05-27.

Centennial Writing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Educational Policy: Origin, Evolution and Experience

Meng Xiaojun Li Chencheng Wu Pei

(1. Party and Administration Office,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2. Center for Studies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of Ethnic Minoritie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The education polic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ccupies the core strategic position in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modern China, and profoundly reflects the centennial vision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nation-state. Looking back to one hundred years, the Party's educational policy always follows the main line of Marxist thought, closely linked with social facts, and unified political and people's nature. After four periods of enlightenment construction, tortuous exploration, reform and adjustment, and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it has guided China's education to achieve a hundred-year change from weakness to excellence. On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policy analysis methodology,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of what to cultivate, how to cultivate and for whom to cultivate people has always been consistent. Its answer concisely integrates the four empirical dimensions of the educational polic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at is, always guided by the developing Marxism, adhere to the Party's comprehensive leadership of education, inherit and develop the Marxist theory of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nd follow the basic law tha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s determine education and education can act fo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s.

Key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ducational policy; education policy analysis; Marxist ideology

[责任编辑: 刘力]